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OUNDATION

History of Chinese Aesthetics


中国美学通史

叶朗 主编 朱良志 副主编

2

汉代卷

任鹏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叶 朗 主编 朱良志 副主编

History of Chinese Aesthetics

中国美学通史

2

汉代卷

任 鹏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美学通史. 第2卷, 汉代卷/叶朗主编;任鹏
著.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4. 1
ISBN 978-7-214-11320-7

I. ①中… II. ①叶… ②任… III. ①美学史—中国—汉代 IV. ①B83-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80747 号

中国美学通史

叶 朗 主编 朱良志 副主编
第二卷 汉代卷
任 鹏 著

策 划 编 辑 王保顶
责 任 编 辑 孙 立
装 帧 设 计 刘葶葶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http://jspph.taobao.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52毫米×960毫米 1/16
印 张 215.25 插页 16
字 数 2980千字
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214-11320-7
总 定 价 680.00元(精装,全8册)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任 鹏 厦门大学

总 序

一

中国历史上有极为丰富的美学理论遗产。继承这份遗产,对于我国当代的美学学科建设,对于我国当代的审美教育和审美实践,对于 21 世纪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有着重要的意义。近代以来,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朱光潜、宗白华等前辈学者对这份美学理论遗产进行了整理和研究,取得了重要的成果。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学术界开始尝试对中国美学的发展历史进行系统地研究,出版了一批中国美学史的著作。我们试图在前辈学者和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写出一部更具整体性和系统性的中国美学通史,力求勾勒出中国美学思想发展的内在脉络,呈现中国美学的基本精神、理论魅力和总体风貌。

二

我们在《中国美学通史》的写作中注意以下几点:

一、《中国美学通史》是关于中国历史上美学思想的发展史。美学是对审美活动的理论性思考,是表现为理论形态的审美意识,所以这部美学通史不同于审美文化史、审美风尚史等著作。

二、中国美学史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美的核心范畴和命题的发展史。一个时代美学的核心范畴和命题的形成和发展,反映那个时代美学的基本精神和总体风貌。这部通史重视研究各个时期的重要美学概念、范畴和命题,力求通过这样的研究勾勒出一个理论形态的中国美学发展的历史。

三、这部通史注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把握中国美学的内在逻辑线索,不同于孤立地介绍单个的美学家和单本的美学著作。

四、中国美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不限于少数学者在书斋中做纯学术的研究,而是与人生紧密结合,与各个门类的艺术实践紧密结合,它渗透到整个民族精神的深处。因此,我们这部通史既注意在哲学、宗教等相关著作中发现有价值的思想,又注意发掘艺术理论、艺术批评中所蕴涵的丰富的美学思想,同时还注意到各个时代的社会生活中寻找美学理论与现实人生相互联结的各种材料,以更深一层地显示美学理论的时代特色。

五、这部通史注意新材料的发现,同时力求以研究者独特的眼光去发现和照亮历史材料中的新的意蕴。这部通史的写作还力求体现我们这个时代的时代精神。这部通史从上古时期的商代开始一直写到1949年,反映中国美学从上古时代到近现代的全幅波动,但并不意味着把它写成过往时代历史材料的堆积,我们力求使这部通史反映当代的理论关注点,反映当代的美学理论的追求,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使它成为一部闪耀着当代光芒的美学史。

三

这部《中国美学通史》是由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组织编写的。由叶朗任主编,朱良志任副主编。全书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这部美学通史共有八卷,分别是先秦卷、汉代卷、魏晋南北朝卷、隋唐五代卷、宋金元卷、明代卷、清代卷、现代卷。

这部书的著者以北京大学的学者为主,同时邀请了国内高校的一批有成就的中青年学者参加。本书从2007年启动,前后经过六年多时间。全书初稿完成后,又组织几位学者进行统稿。参加统稿的学者为:叶朗、朱良志、彭锋、肖鹰。统稿时对各卷文稿作了若干修改,其中对个别卷作了较大的修改。

这部美学通史被列入教育部文科基地重大项目,并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我们对此表示深深的谢意。本书编写过程中得到北京大学相关部门的帮助,很多学者参加过本书从提纲到初稿的讨论,在此一并表示谢意。

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全书还存在着很多缺点,敬请读者提出批评意见。

目 录

序言 1

第一节 秦汉美学分期的说明 5

第二节 秦汉美学研究中存在的若干问题 12

第三节 秦汉美学史的整体理解 29

第一章 大一统意识的萌生:《韩非子》与《吕氏春秋》 37

第一节 战国末期的思想背景:邹衍与荀子 38

第二节 《韩非子》的美学思想 42

第三节 《吕氏春秋》及月令模式 51

第二章 身体的审美场域 75

第一节 先秦儒道的身体观 79

第二节 身体的二重性构造 87

第三节 表里相应的有机模式 100

第四节 枚乘《七发》的审美策略 108

第三章 秦汉易学中的美学思想 118

第一节 序数理数:感应比类的结构 127

第二节 “文”与“离”卦 139

第三节 俯仰往复的时空观 151

第四章 《礼记·乐记》的美学思想	163
第一节 情感与音乐的本源	168
第二节 “心”与音乐的抒情性	175
第三节 音乐与文明世界	183
第四节 乐由中出,礼自外作	189
第五章 汉代《诗经》学的美学内涵	194
第一节 《关雎》的阐释	199
第二节 《毛诗序》的美学思想	208
第六章 苞括宇宙:西汉中前期的美学思想	228
第一节 《淮南子》与其美学内涵	230
第二节 从董仲舒到《史记》:理想与“不遇”	251
第三节 汉大赋的政治美学	271
第七章 儒家美学的确立:从扬雄到王充	284
第一节 扬雄的美学思想	288
第二节 审美历史的建构——关于楚辞与汉赋的论说	303
第三节 人物观的形成及其儒家化	320
第四节 王充的美学思想	331
第八章 因文见道:东汉后期美学思想	351
第一节 文字的哲学认知	356
第二节 “文字”的视觉形式:书法及其理论	366
第三节 文丽以则:形式化的美感	374
第四节 曹丕与《典论·论文》	384
参考文献	401
索引	405

序 言

公元前 221 年,秦王嬴政扫除六合,中央政府的支配力扩展到前所未有的广阔疆域,统一帝国时代自此展开。从秦王朝建立至汉魏禅代时止,历经西汉、新莽、东汉诸朝,帝国的形势虽屡经变动,其统一的面貌却大体得以维持;长达四百余年的统一的历史,奠定了后世“中国”的主要性格——自此即使陷于分裂,“中国”,也至少作为统一的理想而持续存在。作为皇帝与民众、士人与贵族、思想家与政治家们共同面对的现实处境,大一统格局的维系与发展成为时代性的命题。围绕着这一核心观念,秦汉帝国的思想意识开始受到强有力的引导,并生发出一系列的问题。诸如国家政策与经典的确立、地域文化与风俗的交融、教育制度与知识的规整、融通天人的宇宙观念、知识分子的自我定位,等等,陆续进入人们的视野。由于这一点,与处于分裂状态的战国时期不同,秦汉帝国开始展现出独特的面貌,并在思想、文化、艺术诸领域全面而深刻地表现出来。这些因素互相交错、刺激并引导着审美思考,从而造就了以前未曾有的审美思想、审美意识与审美观念。

在秦汉帝国奠立之初,中央集权国家的运转尚处于试验阶段,为了确定理想的政治运作方式而不断探寻;作为与此紧密相连的另一面,在思想与文化的竞技场上,来自不同地域与学派的因素互相交汇、激荡,无

休止地重复着争论、渗透与融合的情形。作为这一不断努力的结果,在历经漫长的统治之后,统一国家的观念已然深入人心,成为自上至下的共识。对于汉末的知识分子与民众来说,致力于维护中央集权国家的存在,乃是不言自明的共同理念;个体与国家之间的二元框架,从根本上成为制约思考之倾向与方式的基础^①。不难想见,围绕着这一显著的转变,相关的现实与思想均相应地产生了种种变化。例如,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在教育与学术方面发挥着不容忽视的遴选、赞助与指导的功能,它直接推动着经典传统的文本化,同时也塑造了儒家思想的主流地位,后者作为经典的守护者而备受尊崇。这些历史状况对秦汉美学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它在某种程度上造就了秦汉美学的主要性格。

作为疆域空前广大的帝国,秦汉被看作中国历史上最为强盛的时期之一,充沛的国力与高扬的姿态,支撑起对逝去历史的各种想象,甚至贯穿于现代民族与国家的自我认同之中。在政治史与社会史的历程中,秦汉中央集权的建立乃是非常显著的事件,中国史的研究往往以此为重点,多方面地描绘出帝国辉煌的外观。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思想史与精神史的书写却相对暗淡。按照普通的理解,当先秦时期百家争鸣的局面不再,思想即转入了长期的沉潜或消化的阶段;直至魏晋南北朝,借助于外来思想的刺激,中国思想终于再一次迎来了异彩纷呈的高峰期。不过,秦汉时期的思想史、文化史与精神史,并未被相应地赋予独特的性格,毋宁说它基本上仍是作为先秦与魏晋南北朝之间的过渡期而被认识的。易而言之,这一时期被塑造成相当沉闷而平淡的阶段,哲学思想、文学乃至艺术理论莫不如此。与这一普遍架构相对应,美学史的情形也大致相同:与先秦、魏晋南北朝激烈壮阔的局面相比,秦汉这一漫长阶段似乎波澜不惊,呈现出较为平静乃至沉滞的状态,美学思想中似乎充斥着

^① 法国学者白乐日(Etienne Balazs)曾经强调了中国哲学中政治与社会维度的重要性,在他看来,“中国哲学基本上是政治哲学”,正是这一性质,导致汉代学者在长期安定的局面之下,不再对古代激进的思想体系产生兴趣。参见[法]白乐日:《汉末的政治哲学与社会危机》,载白乐日著:《中国的文明与官僚主义》,第183页,台北:万象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

雷同与承袭的成分,而相对缺少理论上的突破与创新;各种庞杂甚或荒谬的思想体系,因其难以理解而备受冷落。至少在美学史的多数著作中,秦汉时期之相对缺乏活泼的吸引力,乃是客观存在的现象。如果允许在此做一不恰当的比喻,那么秦汉时期仿佛是交响乐中冗长的慢板乐章,它意味着高潮来临之前令人难耐的平静。

与其他时期相比,秦汉美学往往显得沉闷和乏味。从根本上说,这种低迷的状况并非中国美学界独自造成的结果,而是源自对待秦汉思想的整体立场。早在中国现代学术的开创期,胡适、冯友兰和顾颉刚等学者已经为秦汉思想研究定下了黯淡的基调^①。这一否定态度又为此后的港台新儒家和大陆学界分别继承。在文学方面,亦存在类似的情形。对秦汉哲学与文学的否定性评价,在20世纪中后期的一段时期内达到了顶点。

不过事实可能远非如此。中国美学的历史,如果比拟为诸多支流所组成的水系,其间纵横交互、纷错歧出;而美学史研究的目的,即在于探寻水系的聚散分合,掌握行进的脉络与趋势。由于年代的久远,在辨认细部脉络时无法尽如人意,但是仍不妨碍从整体轮廓上予以把握。很难相信在如此漫长的历史中,当美学长河自先秦发源以后,仅仅是平静而单调地流淌,最终突然隐没在魏晋时期的奇丽山川之间。如果择取秦汉时期的若干截面并加以对比,只需对思想与艺术稍作了解,其间鲜明的差异势必激起我们的惊奇。应该承认,与思想与艺术现象相伴而生的美学,同样充满了转折与起伏;秦汉美学并不是作为思想高峰之反衬的低谷。

与普通的印象相反,在时代剧烈变革的刺激之下,秦汉时期的美学思想不断地展现出殊异的面貌,在四百余年的时间里始终没有停滞于某

^① 相关论述,可参考胡适:《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除中国学者以外,在日本学者如狩野直喜的《中国哲学史》中,秦汉的思想也同样没有能够避免迷信与非科学的批评。

一单调或较为固定的状态。不仅如此,随着存世文献研究的持续深入,以及大量出土文献与文物的重现天日,秦汉美学思想的丰富性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展现。一方面,对于传统美学文献的阐释仍在不断推进,跨学科研究的深入进行,为重新审视和发掘美学资源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另一方面,层出不穷的地下发现(如简帛文献与出土艺术品),也为美学史研究增添了新的材料,这些发现往往改变了此前对学术史与思想史的习惯性理解,从而在中国美学的整体网络中,映射出饶有趣味的崭新图景。即使暂不考虑学术研究在此后的可能的进展,单就现有的状况而言,秦汉美学的研究也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旧有框架。针对这一状况,我们有必要选择更加适宜的新原则或新标准,以衡量该时期美学思想的内涵。

面对秦汉整体形象的丰富与不断更新,我们需要在美学史的领域内集中反思如下的一系列问题——秦汉美学在中国美学史之整体中究竟占有怎样的地位;它为此后的文学、艺术等审美活动以及人生境界的追寻提供了怎样的理论资源,又如何制约着后世美学的发展方向;它的内部包含着哪些显著变化,这些变化何以发生以及如何发生;作为先秦与魏晋南北朝的中间阶段,如果说它并非纯粹的过渡,那么积极的承继性作用是如何显现的;审美思想转变的途径又是如何展开的;秦汉美学究竟具有怎样的独特性格,等等。只有努力从中国美学史的整体理解出发,在宏观的视野中尝试着解答这些问题,才有可能深化对秦汉美学的理解。

鉴于上述情形,参照历史发展的整体进程,努力把握美学史领域的变化,深入展开清晰、准确而富于前瞻性的研究,成为本卷的主要目标。作为开始的概说部分,下面将分别就本卷在分期、研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等方面展开相关的说明,以便对秦汉美学的纲领与特质形成初步的印象。在分别论述的过程中,由于文献与思想、研究现状与目标等因素之间相互交错,因此难免有重复之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中国美学史的研究历程中,诸多著作作为本卷提供了各方面的参考,并时时充当着路

标与指南针的作用。因此,尽管文中更多地针对前期研究的不足而展开,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已有成果的否定;后继者的质疑与批评,正是对筚路蓝缕之历程的最诚恳的致意。

第一节 秦汉美学期分的说明

将秦汉美学视为连接先秦与魏晋的相对独立的形态,未必是圆满的处理方式;年代上的切分,在为学术研究带来便利的同时,也隐含着割裂历史思想源流的危险。如果过分注意分离的一面,并将其投射到对历史现象的理解中去,则可能会引起原本并不存在的错觉,即在承认该阶段之美学特质的同时,相对忽略与前后阶段的内在联系。例如,相对于西汉与东汉的关联,东汉中后期与魏晋的相似性或许更为明显,但是在一般性的思想史论述中,东汉被纳入汉代内部,从而与魏晋构成对峙的印象。针对这一问题,有必要做出如下说明:采用秦汉美学的分期,并不意味着对王朝编年的机械采用。在此还需要思考:在该时段内诸种思想现象何以构成同一个整体;与前后阶段相比,又究竟存在着何种关联。

在中国美学史的写作中,汉代与魏晋的分期差异不大;至于秦与两汉部分的关系,则或分或合并不确定。因此这里的说明主要侧重于秦与两汉的关系。相对于本书合并二者的做法,将秦附于先秦之后的方式似乎更为常见,它们往往将《韩非子》与《吕氏春秋》等内容描述为先秦美学的终结,从而与两汉美学明确地区分开来。从年代上来看,由于《韩非子》与《吕氏春秋》二书均成书于秦统一之前,且除此之外,在短暂的秦代,鲜有明确纪年的美学文献,因此这一区分方式自有其合理之处。不过,在本书中不拟采取这种划分方式。从较浅的层面来看,这种分期实质上取消了秦代的存在;就更深层的理由而言,它没有充分考虑战国末期到秦汉初期的思想发展演变的形态。鉴于分期的这一差异,我在此尝试着进一步提供秦汉合卷的较充分的理由。这里所谓的秦汉合卷,实际上是从稍早于统一局面形成之前的战国末期开始,也就是说,《韩非子》

与《吕氏春秋》等文献将纳入秦汉美学的整体框架之内。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切历史的发展都不是孤立而起的,任何社会或思想界的变动,均是各种或隐或显的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美学史的分期,在截断历史之流的同时,往往与思想演变的实际情形相互出入,颇有方枘圆凿之处。在极端的状况下,分期不过是研究过程中的权宜之计,它并不意味着思想也必定同时发生了截然的变化。进一步而言,分期在反映研究者学术立场与见解的同时,也难免透露出某种主观偏好的因素。在处理秦代美学的归属时,由于这些问题同样存在,因此难免令人踌躇。

就社会形态与学术思想各方面的发展而言,秦与战国末期的联系,如同秦汉之关系一样紧密,将秦划归前后均不乏论据,这增加了分割研究板块的难度。不过,从整体上来看,将略早于秦的部分思想现象纳入后一阶段,是有其充分的合理性的。关于这一点的理解,事实上已不限于单纯的年代问题。虽然在表面上,分期问题不过显示为研究起止界限的确定,但是,如果承认美学史的写作目标不止于罗列材料与事件,而是要进而努力展现内在的脉络,那么关于如何分期的判定,势必在更深的层次上牵涉到如何理解秦汉美学乃至中国美学之整体特质的问题。对此不妨从如下的若干方面展开说明。

首先,从历史整体的外围来看,在政治与社会性格的方面,从战国末期经秦到西汉,显示出相当强的延续性。众所周知,战国末期的混乱状态,至秦统一时戛然而止;经过短暂的集权型态,在秦汉之际再次复现了由分而合的历史场景。在致力于创建大一统帝国的过程中,西汉前期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秦王朝的具体措施,诸如严酷的法家制度、文化禁锢政策等等,而这些正体现出秦应对战国末期的策略。由于西汉初期制度多因袭前代,其间实际上存在着连贯的发展趋势。这一向中央一统不断迈进的历程,构成了秦汉数百年思想的基本背景,不可忽视。这种历史的因循形态与隋唐时期颇为相似;因此在各种中国史分期中,秦之于汉正如隋之于唐,二者往往被合并为整体而加以处理。

其次,从思想的层面加以分析,不难发现更多的内在联系。在受政治影响较为直接的思想领域中,大一统局面的形成及维持,乃是笼罩于其他思想主题之上的时代主旋律。从战国末期经秦到两汉,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和反应,构成了思想意识中最为显著的主线。易而言之,尽管所处时代不同,但是许多思想上的努力,均具有彼此相似的性质,从秦统一形成前夕的《吕氏春秋》,到西汉前、中期的《淮南子》与《春秋繁露》,莫不是此一方面的积极表现。尽管这些著作在思想派别与立场上存在显著的差异,但是,就试图提供统一帝国之基本方案的性质而言,可以说是贯通于秦汉的一脉。

除上述较为外显的因素之外,秦汉在学术领域同样关联紧密。择其大要而言,这种内在的联系,最集中地表现于文献及其所承载的学术思想,对此我们需要从更深的层次来进行理解。早自战国开始,文献在不断的传授、重写、复制、编撰及传播过程中,呈现出异常复杂的演变情形。诸多出土的简帛文献充分证实了这一点。单就文献的编纂与形成而言,其历程往往贯穿于战国与秦、汉,直到相当晚的时期才呈现为相对确定的文本形态。几乎在所有存在争议的文献中,我们既能找出较早的思想因素,又不难发现较晚时期的变动痕迹。由于文献始终处于流动性的状态之中,思想也相应地处于非常活泼的状态,我们很难想象如何在战国(特别是后期)、秦、汉之间做出有效的区分^①。

文献编纂的持续进行长达数个世纪,强调这一事实,有助于我们改变对于汉代的如下偏见:汉代的思想基本停留在复述与承袭先秦思想的层次上。事实上,从战国到秦汉,鲜少存在对先前文献的单纯的复制与抄袭;文献编撰及文本化的持续变动历程,意味着思想阐发的积极性并未消失。伴随着文献编纂与重写的努力,对于学术思想的整体性把握也始终在进行。我们对于先秦学术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来自汉代的重

^① 关于中国早期文献传播的形态及其对学术史的可能的影响,参考(美)柯马丁(Martin Kern):《方法论反思:早期中国文本异文之分析和写本文献之产生模式》,载陈致编《当代西方汉学研究集萃·上古史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